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 区域评价与对策研究

杨友孝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区域评价与对策研究/杨友孝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7

ISBN 7-5005-5922-4

I. 中… II. 杨… III.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 IV.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100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 @ 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9 印张 218 000 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ISBN 7-5005-5922-4/F·520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湖南师范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作为湖南师范大学直接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二级学院，自1996年建院以来，戮力同心，发奋改革，艰苦创业，短短几年，实现了纵身飞跃。迄今，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有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4个本科专业，拥有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4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专业涵盖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并形成了一支学贯中西、朝气蓬勃的师资队伍。

面对中国加入WTO，经济体制转型加速，“新经济”对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的挑战，我院正披荆斩棘，全力打造，充分展示和利用自身在理论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领域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做出新的努力，寻求新的突破。为此，特将我院在这些领域中颇有建树和学术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的最新成果集结出版，形成系列著作，以飨读者。

本次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原理在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农业产业发展的制度分析、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评价与对策研究、中国房地产投资研究、高新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产业经济学专题研究、教育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现代教育投资分析和农产品品牌营销研究等。

我们期望通过本次系列著作的出版，能够为繁荣和发展中国

经济做出学术理论研究上的开拓性贡献，也期望能够使我国经济学界了解我院产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情况，以取得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同仁们的支特、指导与关注。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展，相比之下，我们所呈献给大家的只不过是朵朵红花之间的一片小小绿叶。尽管如此，我们仍衷心期盼这片绿叶能为这春意盎然的学术天地增添新意。

本次系列著作的出版有幸得到湖南师范大学产业经济学重点学科发展基金资助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我院敬致谢忱。

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

刘茂松

2002年7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研究背景与研究途径	(1)
1. 农村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	(3)
2. 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	(8)
3. 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11)
3.1 生态学	(11)
3.2 经济学	(14)
3.3 社会学	(17)
4. 可持续发展类型判断和评价模型	(19)
4.1 可持续性的类型判断	(19)
4.2 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评价模型	(22)
5.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范式	(30)
5.1 旧范式	(30)
5.2 新范式	(32)
6. 本文着重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技术路径	(34)
第二章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评价	(38)
1. 评价模型的评判	(39)
2. 账户项目选定	(42)
3. 基础数据	(43)
3.1 自然资源实物存量	(44)
3.2 污染物排放量	(45)
3.3 其他数据	(46)

4. 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的计算	(48)
4.1 资源价格	(48)
4.2 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	(49)
5. 总体评估结果	(51)
5.1 资源净产值	(51)
5.2 环境净产值	(60)
5.3 真实储蓄	(62)
6. 对其他方案的解释	(64)
6.1 方案 I	(64)
6.2 方案 II	(64)
6.3 方案 III	(68)
7. 结论与讨论	(71)

第三章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77)

1. 区域差异的一般状态	(78)
1.1 资源净产值的区域差异	(78)
1.2 环境净产值的区域差异	(88)
1.3 真实储蓄的区域差异	(100)
2. 区域差异的变迁	(108)
2.1 评价指标与数据处理	(109)
2.2 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	(111)
3. 区域类型划分	(119)
4. 结论与讨论	(123)

第四章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模式选择 (126)

1. 区域模式选择的背景特征	(126)
1.1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	

体制	(126)
1.2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	(129)
1.3 由温饱到小康的社会生活质量目标	(132)
2. 区域模式的合理性判定	(135)
2.1 发展的优势性	(135)
2.2 发展的可持续性	(138)
3. 区域模式选择的技术路径	(140)
4. 不同区域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43)
4.1 京津沪地区	(143)
4.2 辽冀鲁苏浙闽地区	(144)
4.3 晋豫皖赣湘鄂地区	(146)
4.4 云贵川地区	(147)
4.5 吉黑地区	(149)
4.6 粤桂琼地区	(151)
4.7 陕甘宁地区	(152)
4.8 蒙新地区	(154)
4.9 青藏地区	(155)
5. 结论与讨论	(157)
 第五章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制度创新	(160)
1. 制度与制度创新	(160)
1.1 制度的内涵	(160)
1.2 制度创新	(162)
2. 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模型	(164)
3.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区域制度创新路径的解释 ..	(169)
4.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区域制度创新方式的定位 ..	(177)
4.1 诱致性与强制性不可或缺	(177)

4.2 演进式协同推进	(183)
5.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区域制度创新的重点领域 …	(187)
5.1 产权制度创新	(187)
5.2 消除贫困的制度创新	(191)
5.3 农民参与的制度创新	(195)
5.4 耕地保护的制度创新	(197)
6. 结论与讨论	(206)
 第六章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政策响应	(209)
1. 经济可持续的区域政策响应	(210)
1.1 必要的转移	(210)
1.2 产业结构调整	(214)
1.3 农业产业化	(218)
2. 社会可持续的区域政策响应	(223)
2.1 农民负担的减轻	(223)
2.2 剩余劳动力就业	(228)
3. 环境资源可持续的区域政策响应	(234)
3.1 环境资源政策的简单评述	(234)
3.2 区际补偿	(239)
3.3 城乡补偿	(242)
3.4 乡镇企业对农业的补偿	(245)
4. 结论与讨论	(248)
 第七章 主要结论及讨论	(253)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77)

第一章 绪论：研究背景与研究途径

农村是一个独特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地域空间实体。作为城市的母体，它孕育了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却与城市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国际统计学会将居民人口超过 2000 人以上的居民点称为城市地区，其余广大地区为农村。联合国则将 20000 人以下的区域定义为农村。从经济功能的角度来看，农村人口主要进行田园式劳动，城市人口主要进行公务式劳动。在农村范围内，农业是主体，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较多，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动或多或少与农业生产有联系，人口密度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农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与城市相比，传统农村的土地利用是粗放的，农业和林业等土地利用特征明显；小和低层次的聚落深刻揭示出建筑物与周围环境所具有的广阔景观相一致特征的重要关系；农村生活的环境与行为质量是广阔景观的有机构成，是农村特有的生活方式。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农村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农村不仅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民聚居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经济生活的整体，具有多方面独立活动的功能；农村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社会，融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农村不仅包括经济和社会活动，还包括自然环境因素，是具有一定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功能的地域综合体。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社会、经济及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明显，农村发展的进程极端不平衡，并存着三种不同的农村类型。

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资金、技术和人才匮乏，生产落后，生活贫困，基本上属于传统型。在大多数平原和丘陵地区，乡镇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发展多有了良好的起步，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属于近代型。在沿海、沿江、大城市郊区等地方，现代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农村社会生产总值中，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的比重，农民收入水平接近或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属于现代型。中国农村目前正处于由近代型向现代型过渡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有更深刻的内涵。首先，原来二元经济结构下受抑制的未分化的农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断分化，产生出了大批的新兴城镇，加之实行“市管县”体制，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两者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第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城乡两种社会形态和两大利益集团随着改革的深入已经开始嬗变。户口管理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松动，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这个等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等式的性质日趋复杂。第三，城乡两大不同性质的经济板块碰撞，后者因其活力充分得以发挥而使其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特别是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过程的形成与完善，农村的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自然经济的成分逐步弱化。第四，乡镇企业发展冲破了城市代表工业、农村代表农业的传统产业分工，出现了城乡两大工业系统和双重的工农关系。一方面是农村落后经济与城市现代经济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在农村经济内部，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与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之间形成了另一层次的二元结构。在某些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地区，无论非农化水平还是经济总量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就使得农村和城市的边界更加模糊。可见农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既是一个

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时的农村范围是指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包括了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农村新兴小城镇，部分中小城市及大城市郊区的卫星镇或开发区。这样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便于和现行的农村统计年鉴基本保持一致，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它们是乡镇企业生产的主要空间载体。

1. 农村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等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下，对“增长=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其中描绘了农药污染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10年后，两位著名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Dubos）的享誉世界的《只有一个地球》问世，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可持续发展的境界。同年，一个非正式国际著名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有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G.H.Brundland）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这一可持续发展概念（WCED, 1987），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

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界的极大重视。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可持续发展得到与会者的共识与承诺，为了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各国政府决定建立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了实现一个更有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经济，这种伙伴关系责成各国进行持续不断的建设性对话（UNCED, 1992）。UNCED 的《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求，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国外学者穆拉辛格（Munasinghe et al.）认为，WECD 的定义在字面上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当代人为了发展不得不继续改变生物圈，被改变过的生物圈则在将来选择利用的可能性价值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在当代人的利用和后代人的选择之间做出相互妥协。萨拉格丁（Serageldin）认为 WECD 的定义在哲学上很有吸引力，但在操作上有困难。更多的学者和机构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定义。Meadows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代代相继的发展，它有足够的柔性、智慧和远见确保自然和社会支持系统不被破坏。”Goodland 从经济学角度将可持续性定义为“维持资本不变”，他所说的资本包括人造资本（由人所创造的产品和技术，包括所建设的环境）、人力资本（对社区和生产做出贡献的人和知识团体）和自然资本（产生自然资源流量的存量）。萨拉格丁则将社会资本（具有良性循环的公民间的互信、互惠、互助的社会关系“储蓄”）也考虑在内，将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定义为“我们留给后代人的以上四种资本的总和不少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的资本总和。”Pearce 和 Warford 从福利的角度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当发展能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也有从机会和效用的角度来定义的。Howarth 认

为当代人享受机会均等，必须确保这些机会代代相传而不减少。把可持续性定义为效用非减，极富启发意义。但由于未来偏好和技术的不确定性，这一定义实际上存有疑问。然而，通过提供后代人特有的再生资本、技术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生活机会能得以维持。因此，只要能充分证明资本和自然资源之间的替代既有利于当代人又有利于后代人，则这种替代是可行的。

Goodland 对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作了区分。环境可持续性指的是维持生命支持系统，这与生态学家的生态可持续性的内涵一致，其核心在于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关系；经济可持续性指的是维持经济资本增长，是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学表述，与希克斯的收入定义一致，即：不减少未来真实消费的前提下，用于开销的收入达到最大；社会可持续性指的是维持社会资本的增长，它与社会学家的人类价值观密切相关，强调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力保持平衡，同时，谋求人类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人类自由和平等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可持续发展则是这三者的综合，并利用它们驱动发展持续下去。尽管可持续性的精确含义存在分歧，但在实际运作中能够协调各种观点的定义可能是“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1993; Farrell et al. 1998）。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和内涵探索，我国学术界立足自身国情，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了系列的探索。马世俊和王如松在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把这种发展归纳为“总体、协调、再生”六个字。叶文虎和栾胜基也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和资源与财富分配上的时空公平。张坤民除了强调这种协调以外，还强调可持续发展不否定经济增长，但穷国需要重新审视如何推动和实现经

济增长。牛文元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和环境承载力论、环境价值论与协同发展论方面，论述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蔡运龙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环境承载力的极限范围内，人类文化调节可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持续性。

与普遍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形成密切相关的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世纪中叶出现的西方石油农业以其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土地生产力，将农业发展带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然而，它却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退化和能源消耗过度的高昂代价。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在探索可能替代的途径。先后出现了替代农业（Alternatice Agriculture）、有机农业（Organic A.）、生态农业（Ecological A.）、生物农业（Biological A.）、生物动态农业（Biodynamic A.）、再生农业（Regenerative A.）、超石油农业（Super – oil A.）、自然农业（Natural Farming）、外部资源低投入持续农业（Low – external – input sustainable A.）等思潮。

持续农业一词首先出现在美国。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持续农业研究教育法”，并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成立了“持续农业研究所”。1987年，UNCED提出“2000年：转向持续农业的全球政策”。198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活动的决议。1991年，FAO又在荷兰召开了有关农业与环境的国际会议，初步提出了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在此期间，提出了持续农业的种种定义，其中以美国农学会（ASA）、美国作物学会（CSSA）和美国土壤学会（SSSA）所讨论的一致的观点最有权威。他们认为，“持续农业指的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有利于改善农业所依存的环境与资源，提供人类对食物与纤维的需要、经济可行并提高农民以及整个社

会活动的一种做法”。国内学者从中国人多地少、当前农业与粮食水平低这一现实出发，提倡集约持续农业（Intensive-sustainable agriculture）。或是从“中国生态农业已经不同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生态农业，而与国际上的持续农业的主张非常相似”这一现实出发，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

80年代后期，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开始形成雏形（Isaac, 1987）。FAO在荷兰召开的“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登博斯宣言》，提出了“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即 SARD）的新概念。这一概念创新的意义在于它首次把农业和农村联为一体。《登博斯宣言》对可持续农业定义是：“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机构改革方向，以便确保获得和持续满足目前几代人和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这种持续发展能保护土地、水资源、动植物遗传资源，而且不会造成环境退化，同时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能被社会所接受”（FAO, 1991）。《登博斯宣言》未将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定义，也未对农村可持续发展予以单独定义。但从其基本内容中可以看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是：在合理利用和维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农村体制改革和技术革新，以生产足够的食物和纤维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农产品的需要，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郭焕成认为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应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改变目前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方式，转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和完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市场运行机制与技术体系，形成“种养加、贸工农、农科教”相结合的格局，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生产条件，创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持续性的统一，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道路。

从发展的系统观来看，农村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以追求农村空间系统的整体利用有序化，农村经济职能（供应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财富和生产资料）与公益职能（提供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自然环境）的最优化以及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协调进化为永恒目标”的一种发展。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可持续发展在中国这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具体化和操作化，即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农村的具体行动和实施过程。根据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理念和中国农村的独特性，本文把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审慎的环境保护措施、适度的人口增长和新型的生活消费方式的前提下，努力地满足当代人对农村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农民自身的需求，谋求区域间和城乡间的福利同步增长，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上述同类需求的能力。这意味着这一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农村这一特定地域空间，不仅要考虑代际和代内的公平，还必须考虑农村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公平。

2. 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

《登博斯宣言》一问世，很快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和行动纲领。《中国 21 世纪议程》（1994）吸收国际 SARD 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 SARD 目标是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

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中国 21 世纪议程》为中国 SARD 设计 7 个方案领域：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管理；加强食物安全和预警系统；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组合；提高农业投入和综合生产力；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可持续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乡镇中心。我国 20 余年来持续开展的生态农业研究和近百个生态县、乡建设，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模式，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博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 FAO 的赞赏。此外，有关 SARD 理论的纵深研究也十分活跃。1992 年起，已在全国不同生态区建立了 25 个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试验点。

面对 SARD 这一世界性的重大论题，虽然各国所面临的任务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在关键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却有显著的区别。例如，发达国家比较重视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农产品剩余和国际贸易也成为一个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则是如何增加农产品数量以应付人口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双重压力，“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也是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实际上，SARD 战略在 80 年代后期已具雏形。“农业与环境会议”后，这一战略得到国际决策界和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形成了研究的热潮。经过几年的探索，SARD 作为一个新概念和宏观战略目标，已得到广泛的认同。

王道龙和羊文超将 SARD 基本内涵作了很多好的概括：（1）“三个生”（生产、生活、生态）是 SARD 的永恒主题；（2）“三个农”（农民、农业、农村）是 SARD 的中心内容；（3）“三个原则”（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是 SARD 的主张；（4）“三个持续性”（经济持续性、社会持续性、生态持续性）是 SARD 的特征；（5）“三个良性循环”（经济良性循环、社会良性循环、自然良性循环）是 SARD 的运行机制；（6）“三个效益”（经济